

風雷激蕩：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

# 風雷激蕩 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

章百家·主編

# 序

2021 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辰 100 週年。

自 1921 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取得了彪炳史冊的輝煌業績，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發之際，用黨的宗旨和優良傳統教育人、用黨的成功經驗啟迪人、用黨的歷史教訓警示人、用黨和人民共同的奮鬥歷程激勵人，是黨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職責和義務。

改革開放以來，黨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許多以往被遮蔽的歷史真相被披露，許多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經釐清，黨史的內容和範圍有了極大的拓展。但是，許多新成果還停留在黨史圈內，尚未為一般人所知曉。而且，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也需要向廣大黨員幹部和大眾讀者作較為系統的介紹。

全書分 40 個專題，每個專題 5000 字左右。其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0 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8 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14 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8 個。各專題獨立成篇，便於閱讀，內容涵蓋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社會等方面。

在撰寫此書時，我們遵循以下四條原則：(1) 突出中共黨史的主線，力求較為完整地呈現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的奮鬥、探索和黨的自身建設歷程，以及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巨大變化；(2) 所選專題緊扣主線，視野力求寬闊，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記述要講清原委，詳略得當，評價中肯；(3) 史實準確，每篇文章在大的方面要反映黨史學界認可的新進展和主流觀點，同時也要體現撰寫者個人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思考；(4) 語

言平實流暢，全書不加註釋。

參與本書策劃編寫的 5 位學者分別是章百家、黃如軍、武國友、孫大力、董潔，均為長期致力於黨史研究的專業人員，選題的分配按每位作者的研究專長確定。全書最後由章百家統改定稿。對本書的不足和錯誤之處，衷心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章百家

序

*i*

第一篇 星火燎原

---

紅船啟航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002

喚起工農

風起雲湧的大罷工與農民運動 011

怒潮湧起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大革命運動 017

另闢天地

走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028

戰略轉移

紅軍長征與遵義會議 035

統一戰線

國內時局轉換與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 043

制勝之道

持久戰與敵後遊擊戰爭 050

向着光明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 057

十字街頭

從重慶談判到全面內戰 066

扭轉乾坤

從自衛戰爭到戰略決戰 073

## 第二篇 改天換地

---

### 八方會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082

### 凱歌行進

改造舊社會，鞏固新政權 090

### 國之四維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097

### 良好開端

對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 105

### 實事求是

全黨調查研究與七千人大會的召開 113

### 為了「四化」

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幾曲凱歌 121

### 風雲變幻

新中國建立新型外交關係的歷程 129

### 人心所向

粉碎「四人幫」，結束十年內亂 137

## 第三篇 改革開放

---

### 偉大轉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48

### 撥亂反正

實事求是鄭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156

### 繼往開來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163

### 革除弊端

政治體制改革的啟動與初步實踐 171

<b>聯產承包</b>	
中國農村的大變革	179
<b>接軌世界</b>	
從建立經濟特區到加入世貿組織	186
<b>經濟轉軌</b>	
從計劃到市場的探索與實踐	194
<b>「一國兩制」</b>	
兩岸關係新篇章與港澳回歸祖國	202
<b>外交新局</b>	
從「一條線」到「全方位」	211
<b>旗幟高揚</b>	
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確立	219
<b>與時俱進</b>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228
<b>以人為本</b>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貫徹	235
<b>精神文明</b>	
弘揚共同理想，繁榮社會主義文化	243
<b>承前啟後</b>	
跨世紀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251

#### **第四篇 進入新時代**

---

<b>新時代的引領</b>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確立	262
<b>全面深化改革</b>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269
<b>全面從嚴治黨</b>	
反腐敗標本兼治，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277

<b>全面依法治國</b> 建設法治中國，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285
<b>建設美麗中國</b>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292
<b>實施強軍戰略</b> 開創軍隊改革和國防建設新局面	299
<b>堅持和平發展</b>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	307
<b>全面建成小康社會</b> 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315

第一篇

---

# 星 火 燎 原

# 紅船啟航

##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是 20 世紀初期在國內外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下誕生的。百年之後，在回溯這個毛澤東稱為「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時，我們的視野更加寬闊，對這段歷史的背景和細節也有更多更準確的了解。

### 一、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政黨政治的出現

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中國社會性質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也悄然發生變化。

進入 20 世紀，由於國際國內一系列原因，中國社會的變遷呈加速之勢。其主要方面是工人階級的長成、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和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形成。這就為即將到來的中國社會變革準備了物質、人才和思想基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這場革命雖以妥協告終，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僅存在 3 個月就被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政府所取代，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未能實現，但是，這場革命卻開闢了 20 世紀偉大中國革命的時代，其具有的深刻內涵隨歲月流逝而愈加彰顯。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樹起民主共和的旗幟，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中華民族的覺醒，激勵起一大批志士仁人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行民主而英勇奮鬥，從此反動勢力再不能建立起鞏固的統治。

辛亥革命也掀起了中國近代政黨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種名目的政綱、宣言遍佈報刊，各種「主義」開始在社會上流傳。除政治方面的變化之外，辛亥革命還加快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文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價值判斷、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僅有利於吸引和動員人們關注和參與政治生活，也極大地拓寬了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視野。

## 二、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辛亥革命失敗了。此後 10 年，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政局動盪不定。紛亂的時局激發人們重新思索救國之道，新文化運動便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

1915 年 9 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他認為，要改變中國，必須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一年後，這本雜誌更名為《新青年》，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新文化運動能夠蔚成風氣，引導潮流，還得益於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實行的教育改革。1917 年 1 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執教，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風。《新青年》也由上海遷到北京，為各種新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條件。自此，新文化運動迅猛發展起來。

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針對辛亥革命後中國民主政治試驗的失敗和群眾思想的蒙昧落後，反對專制和迷信盲從，鼓吹

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這場運動的另一項主要內容是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實行文學革命，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文學革命的意義並非僅限於文學方面。如果沒有白話文的流行，外國的新概念、新思想便無法準確地譯成中文，介紹給國人並為國人所理解。革新思想與革新文學有機地聯繫起來，使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啟蒙運動。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這場運動的倡導者們最初曾鼓吹「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然而，慘烈的世界大戰使中國人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矛盾，這種制度在國人心目中備受推崇的地位開始動搖。

戰爭與革命在歷史上經常互相銜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首先在俄國發生了兩次革命。1917年3月（俄曆2月）發生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統治俄國達300年之久的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當年11月7日，俄國又爆發「十月革命」。在列寧領導下，彼得堡的工人群眾和士兵發動武裝起義，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接着，歐洲掀起一場大範圍的革命風暴。隨後兩年，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鬥爭也高漲起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然而，在1919年初舉行的巴黎和會上，英、法、美等列強不僅拒絕了中國代表團提出的正義要求（包括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軍隊和巡警、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條」等），而且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在人民群眾中，首先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激起強烈的憤慨。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13所大中專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到天安門前集會，五四運動就此爆發。從5月初到6月初，這場運動以學生為主。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罷工高潮時達到10多萬人。上海商人也舉行罷市。工人罷工的浪潮迅速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和100多個城市。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

台，使五四愛國運動突破學生、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發展成為全國範圍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人民的巨大壓力下，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和會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猛醒」，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明顯動向是轉向社會主義。相當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義的同時，也懷疑甚至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社會主義學說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不過，五四時期傳播的社會主義學說十分龐雜，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等各式各樣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思想流派。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比較和試驗，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國的工具。

李大釗是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第一人。1918年，他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3篇文章，熱烈讚揚十月革命，指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已成為世界潮流。1919年秋季，他又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這篇文章表明李大釗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同時也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

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新舊思潮交鋒的漩渦中，通過切身經歷和體會，逐漸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和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也轉變成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段時間，還有一批海外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如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等，都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有所貢獻。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當中國人對西方列強深感失望之時，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蘇俄的承諾後來並未完全兌現，但當時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這對於擴大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促進科學社會主義的傳播也起到重要作用。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發展成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

動。據統計，當時在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多達 200 多篇。這樣集中介紹國外的一種思想理論，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實屬罕見。「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開始成為中國先進分子的心聲。

經過辛亥革命後 10 年的積澱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在中國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型政黨的條件逐漸形成。

### 三、中共早期組織的建立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過程中，中國南北方各形成了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大約在 1920 年 2 月就討論過這個問題。

1920 年 3 月，由李大釗主持在北京大學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 5 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兩個中心，先後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先進分子建立聯繫。這一時期，相繼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除李大釗、陳獨秀外，還有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吳玉章，以及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惲代英、瞿秋白、趙世炎、張聞天、向警予等一批年輕人。

恰在此時，蘇俄和共產國際也通過各種渠道派遣使者來華了解中國革命運動的情況。其中，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直接接觸的第一人是維經斯基。他於 1920 年 4 月來到中國，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又前往上海與陳獨秀見面。通過交談，李大釗、陳獨秀等增加了對俄國革命和蘇俄政策的了解，維經斯基也初步得知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情況。隨後，維經斯基又接觸了其他一些進步社團，並向陳獨秀提出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建議。

1920 年 8 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 2 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該組織

成立後即通過寫信聯繫、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着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同年 10 月，北京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地點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只有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 3 人，以後又陸續發展了一些黨員。1920 年底，北京黨組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其成員大多是北京大學的進步師生。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的先進分子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的先進分子，也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兩項工作：一項是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另一項是深入工廠、礦山、碼頭，開展工人運動，促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

1920 年 9 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將《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隨後，又創辦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介紹革命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推動建黨工作的開展，並出版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譯本。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採取出版報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利用學校講壇等多種形式，建立並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

這時，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已達到 200 萬左右。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積極開展對工人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義創辦各種勞動補習學校，結合工人生活和鬥爭，訴說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傳播革命道理，宣傳馬克思主義。這在工人群眾中引起廣泛共鳴。

由於黨的創建活動是在秘密狀況下進行的，各地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沒有統一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直稱「共產黨」。從性質和特徵方面來看，它們都是後來組成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 四、中共一大的召開與民主革命綱領的提出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後到達上海。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聯繫，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原定在7月初召開，後因各地代表難以按時抵達而推遲至7月下旬。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宅內召開。國內各地和旅日黨組織派出代表參加，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派遣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着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在廣東的陳獨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釗均因事務繁忙，未能出席會議。7月30日晚，會議因一敵探闖入而立即中止。此後，代表們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遊船上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

中共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但從這時起，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一年以後，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黨的二次

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共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自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具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明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中國先進分子之所以選擇馬列主義，或者說馬列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是由於它提供了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開展階級鬥爭以實行社會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革命政黨。這是當時傳入中國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論都不具備的。

第二，黨的綱領以中國現實的政治需要為依託。雖然從形式上看，中共的綱領受到共產國際的很大影響，但其反映的訴求完全是中國的。黨的最低綱領即現階段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一最低綱領與中華民族面臨的歷史任務具有高度一致性。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這又與中國傳統的「均貧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三，中共在最初的革命活動中就表現出自己鮮明的階級屬性。中共成立之初，黨員人數很少，成分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是，中共採取了其他任何政黨都沒有採取過的辦法，即深入中國社會底層，與工農結合，發動工農運動。先進的知識精英主動投身和引導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革命，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上述三個特點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具有長遠影響。主要是：黨的奮

鬥目標是可以長期堅持的，這一奮鬥目標對立志改變中國面貌的先進分子和希望改變自身命運的廣大人民群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同時，這一奮鬥目標使中國共產黨有理由相信，自己不僅是工人階級，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這使中國共產黨人具有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不畏艱難、前赴後繼，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奮鬥。

（章百家撰稿）

# 喚起工農

## 風起雲湧的大罷工與農民運動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明確自身的性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從中共一大至三大，尚處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便以大無畏的勇氣，發動和領導了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其他方面的群眾運動，踐行「為無產群眾奮鬥」的諾言。在風起雲湧的工農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獲取了寶貴的鬥爭經驗，錘煉出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和不怕犧牲的精神。

### 一、中國工人運動的興起與第一次高潮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首先集中力量開展工人運動。為加強統一領導，一大結束後僅十幾天，1921年8月11日，黨在上海成立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任總主任，出版指導工人運動的機關刊物《勞動週刊》。隨後，在各地相繼建立分部。北方分部在北京，羅章龍任主任；湖南分部在長沙，毛澤東任主任；武漢分部在武昌，包惠僧任主任；廣東分部在廣州，譚平山任主任；天津分部，安幸生任主任；山東分部在濟南，王盡美任主任。

在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參與、推動、組織和領導下，以1922年1月香

港海員罷工為起點，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為終點，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13個月的時間裡，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餘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其中，香港海員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充分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

香港在鴉片戰爭後淪為英國的殖民統治。這裡的中國工人深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首先發起有組織的反抗。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員6000餘人，為抗議英帝國主義一再拒絕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的要求，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蘇兆徵、林偉民等領導下，舉行罷工。港英當局和資本家拒不答應海員的要求，並採取各種手段，威逼海員工人復工，遭到拒絕後隨即下令封閉海員工會。

2月底，香港各行業工人聲援海員工會，舉行總同盟罷工，罷工人數增加至10萬人以上，席捲整個香港，使香港成為「死港」。3月4日，港英當局派出大批軍警，阻攔、鎮壓罷工工人，並在九龍附近的沙田向罷工人群開槍射擊，打死6人，打傷數百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沙田慘案。英國軍警的暴行，激起廣大工人和各階層群眾的義憤，總同盟罷工繼續擴大。

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革命政府和全國人民聲援下，香港海員大罷工堅持了56天，至3月8日，迫使港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接受恢復海員工會原狀、增加工資、撫恤死難工人家屬等要求。罷工的勝利，鼓舞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勇氣和信心，有力推動了工人運動的發展。這次罷工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蘇兆徵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2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名義，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次大會加強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總結了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實際上確立了中共在全國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隨後，於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更加重視工人運動。這次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各地黨組織集中力量組織產業工人工會，領導工人為爭取改善生活和勞動條件而努力，同時必須領導工人開展政治鬥爭。黨的二大以後，工人運動持續高漲，全國各地的罷工鬥爭方興未艾。

1922年9月，在湖南爆發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這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第一次大罷工。安源路礦是江西萍鄉安源煤礦和湖南株洲到萍鄉的株萍鐵路的合稱。該企業是日本資本控制的漢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7萬餘人。長期以來，工人們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與壓迫，勞動條件差，生活困苦不堪。

1920年11月，黨的一大前，毛澤東就曾到安源考察，對工人的狀況印象深刻。1921年秋冬，毛澤東作為湖南支部書記又兩次到安源考察，向工人宣傳黨的主張。年底，湖南黨組織派李立三等到安源開展工作，開辦工人補習學校，在工人中發展黨團組織，先後建立安源黨支部和工人俱樂部。黨組織又陸續派蔣先雲、毛澤民等去安源開展工作。5月中旬，毛澤東第四次到安源，召開安源路礦黨支部會議，了解情況。9月初，毛澤東第五次到安源，對罷工作了部署。罷工前，湖南黨組織又派劉少奇到安源加強領導。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始。由於工人的英勇鬥爭和社會各界的聲援，在李立三、劉少奇等正確領導下，路礦當局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條件，罷工以工人的勝利宣告結束。工人俱樂部成員迅速由罷工前的700餘人發展到1萬餘人。

1923年2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產生了重大的全國性影響，將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推向頂點。罷工前，在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的持續工作和指導下，京漢鐵路全路各站工人幾乎都被組織起來，全路共組織了16個工人俱樂部。在此基礎上，在共產黨人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等領導下，定於1923年2月1日，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此時掌握北京政權的軍閥吳佩孚下令「制止開會」。參加會議的代表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攔，進入預定會場，宣佈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但會議遭到軍警的破壞，總工會隨即號召全路工人舉行罷工。同時，決定將總工會臨時辦公處轉移至漢口江岸。2月4日，3萬多名工人舉行全線總罷工，長達1200多公里的京漢鐵路頓時陷入癱瘓。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威脅了外國列強在中國的統治利益，在他們支持下，軍閥吳佩孚調動 2 萬多軍隊，2 月 7 日，在漢口、鄭州、長辛店等地同時對工人進行殘酷鎮壓。罷工工人 52 人被殺害，300 多人受傷，40 多人被捕，1000 多人被開除，大批家屬慘遭迫害。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被敵人綁在車站的電線杆上連砍數刀，寧死不屈，壯烈犧牲。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被秘密殺害於武昌。隨後，吳佩孚在各地大肆搜捕共產黨人。二七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發表《為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告工人階級與國民》書，號召全國人民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打倒壓迫和殘殺工人的軍閥。全國各地工人和各階層群眾，迅速掀起一個聲勢浩大的聲討軍閥、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的運動。為保存革命力量，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於 2 月 9 日下令復工。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 二、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建立農民協會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以主要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派出力量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和青年運動、婦女運動。這些方面的工作擴大了黨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影響。其中，尤以黨所領導的農民運動意義最為深遠。

中共一大結束不久，黨領導的早期農民運動首先在浙江蕭山、廣東海陸豐和湖南衡山等地興起。農民運動得以興起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未能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兌現「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廣大農民群眾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剝削和壓迫的狀況沒有改變。

中國最早的農民協會建立於 1921 年。當年夏天，共產黨員沈玄廬回到家鄉浙江蕭山縣衙前村，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不久，在上海、杭州等地求學、教書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宣中華、楊之華等也回到家鄉，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在他們的努力下，同年 9 月 27 日，衙前村農民大會召開，成立了衙前村農民協會，通過了農民協會章程和宣言，這是中國第一

個新型的農民組織，中國最早的農民協會。衙前農民協會成立後，組織領導農民開展的減租、反對地主苛政等鬥爭，為農民爭取自身利益的鬥爭注入了新的因素。

衙前農民協會成立的消息，很快在當地產生了很大影響。1921年冬，紹興等周邊縣幾十個村莊的農民，紛紛起而效仿，以衙前為榜樣，先後建立了80多個農民協會。這些農會把農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為維護農民的利益進行了多方面的鬥爭。農會的興起，遭到了反動政府的鎮壓。同年底，衙前農民協會正在召開減租大會，反動軍閥部隊突然包圍衙前村，抓捕協會領導人員，強行解散協會，同時武力解散周邊地區剛剛興起的其他農民協會。

海陸豐農民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領導的範圍最廣、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農民運動，其主要領導者是留日回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彭湃。1922年6月，彭湃回到自己家鄉海豐縣赤山約（約相當於後來大的鄉——編者註），向貧苦農民宣傳革命道理，發動和組織農民，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民協會——六人農會。隨後，他奔走於海豐其他地區，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號召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會。不久，海豐的很多地方都相繼成立農會。是年年底，會員發展到2760戶，約16590人。1923年1月1日，海豐縣總農會成立大會在縣城隆重召開，彭湃在會上報告了海豐縣總農會籌辦情況，各地報告了農會和農民運動發展情況，通過了海豐總農會章程，選舉彭湃為海豐總農會會長。此後，彭湃又到陸豐、惠陽兩縣開展農民運動。由於有了海豐農民運動的聲勢和經驗，兩縣農會迅速發展，農民運動蓬勃興起，農會會員發展到20多萬人。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1923年5月，彭湃將三縣農會改組為惠州農民聯合會，並擔任會長。7月，惠州農民聯合會又改組為廣東省農民協會，彭湃被推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農會的發展壯大，農民運動的興起，引起地主階級的仇視，他們勾結當地反動政府對農會進行鎮壓，致海陸豐地區的農民運動幾遭挫折，農會

骨幹被捕，活動被迫轉入秘密狀態，彭湃也不得不離開海陸豐。但是，這一地區的農民運動，有力打擊了封建地主勢力，為以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發展打下了群眾基礎。大革命運動興起後，1924年4月初，被譽為「農運大王」的彭湃抵達廣州，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海陸豐農民運動發端之時，湖南衡山嶽北地區的農民運動也很有聲勢。該地區靠近水口山礦區，1922年11月，水口山礦工舉行罷工時，當地農民受到鼓舞，曾自動組織起來支援工人兄弟的鬥爭。1923年4月，中共湖南湘區委員會和毛澤東曾派遣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到這一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經過半年多艱苦深入的工作，他們在這裡建立了黨、團組織，於當年9月成立了湖南第一個農民運動的組織嶽北農工會。到年底，發展了數萬名會員，並領導農民開展平糶及阻止地主將穀米和棉花運出境的鬥爭，在湖南造成了很大聲勢和影響。雖然不久後，湖南嶽北地區的農民運動遭到地主、土豪劣紳和反動軍閥的聯合鎮壓，不得不轉入秘密活動的狀態，但是，這一時期的農會組織和農民運動，為後來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迅猛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即將主要精力用於動員、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這使中國共產黨有了不同於其他任何政治派別的階級基礎和獨特的社會影響力。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在隨之掀起的席卷全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蓬勃發展，成為浩蕩革命大軍中的兩支主力。

（黃如軍撰稿）

# 怒潮湧起

##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大革命運動

在經歷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之後，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力量遠比帝國主義、軍閥和封建勢力弱小得多，要爭取革命勝利，必須聯合其他革命力量，結成統一戰線。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隨之，一場以「打倒列強，除軍閥」為主要目標的革命運動席捲中國大地，史稱「國民革命」或「大革命」。

### 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催生大革命運動的關鍵因素，這一合作從設想到形成幾經曲折。

早在1920年6月，列寧在為共產國際二大草擬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在絕對保持獨立性的前提下，「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按照這一設想，共產國際和蘇俄不斷派出使者到中國尋找同盟者，最初的政策取向是聯合更有實力的軍閥吳佩孚、陳炯明，疏遠孫中山。然而，1922年6月，陳炯明在帝國主義支持下背叛革命。1923年2月，吳佩孚殘酷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此後，共產國際才轉向全力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並力促國共合作。

實行國共合作的建議由共產國際執委馬林首先提出。1921年底，馬林從上海出發，到中國南方考察。他在廣西桂林拜訪了孫中山，勸說其實行聯俄聯共政策，但孫中山未明確表態。1922年4月，馬林回到上海後，又向陳獨秀等人提出國共合作問題，但陳認為尚無此條件，予以拒絕。此後，馬林返回莫斯科，將這一建議提交共產國際，獲得批准。當年8月，馬林攜共產國際指示再次來華。

這時，國共兩方面的情況都有所變化。在遭受陳炯明背叛的打擊後，孫中山決心改組國民黨。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提出聯合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全國一切革命黨派，改變了黨的一大關於不與其他黨派建立聯繫的規定。不過，中共設想的國共合作，擬採取兩黨獨立並行的方式。

8月25日，馬林在李大釗陪同下再次會見孫中山，商談了改組國民黨、聯合蘇俄以及國共合作等問題。經過馬林等人的艱苦工作，孫中山決定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同時，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實行兩黨合作。當時，國民黨號稱有黨員20萬名，而中共黨員尚不足百名。兩黨在國民黨內實行合作，是孫中山可接受的唯一形式。

隨後，中共主要成員與馬林在西湖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雙方就國共合作方式問題發生激烈爭論。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明確表示不同意馬林在國民黨內進行合作的主張，擔心這將削弱黨的獨立性。馬林則強調這是共產國際的決定。結果，會議未能形成正式決議，僅根據陳獨秀的意見達成一項諒解，即當國民黨取消打手模以示遵從孫中山個人的做法後，中共少數負責人可以根據黨的指示加入國民黨為其黨員。顯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馬林關於中共黨員無條件、無限制加入國民黨的主張。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着重討論國共合作問題。由於爭論激烈，陳獨秀為會議起草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最後僅以5票的優勢（21票贊成，16票反對）通過。中共三大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

國共合作；同時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中共三大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中共三大以後，國民黨改組的各項工作加緊進行。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雖然是中國資格最老的革命政黨，但歷經多次挫折後，成分複雜，組織鬆散。孫中山深感必須對國民黨實行改組，吸收新鮮血液，這是他願意吸納具有革命朝氣的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原因。他還認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後將會皈依三民主義。由於孫中山提出的改組方法是「以俄為師」，「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所以在整個改組過程中，共產國際和蘇聯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邀請，共產國際和蘇聯代表鮑羅廷抵達廣州。不久，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並不斷委託其辦理有關改組的重大事宜，如提出改組的任務、方案，起草國民黨的組織法、黨章、黨綱、一大宣言等。在共產國際、鮑羅廷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共黨員的幫助下，孫中山力排眾議，堅持改組國民黨。至1924年初，改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孫中山主持。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其中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詮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一致，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林伯渠、瞿秋白、譚平山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佔總數的1/4。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仍然相當複雜，但它已初步成為工人、農民、

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 二、五卅運動與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舉行，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後，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民黨一大閉幕後，孫中山便開始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島籌辦陸軍軍官學校（通稱黃埔軍校），並獲得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他在歷經挫折之後，深感利用軍閥武裝是行不通的，必須建立一支忠誠的國民革命軍。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佔總數約1/10。

與此同時，國共合作也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同月，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開辦，先後六屆均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骨幹。次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傳遍全國。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了當時由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開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等主張，影響廣泛。

在孫中山北上期間，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這次大會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由於實踐經驗有限，黨還不可能對如何實現領導權，

以及如何處理與此相關的各種複雜問題作具體回答。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宣傳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實行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

以1925年的五卅運動為標誌，國民革命的高潮到來了。這場規模空前的反帝愛國運動從上海開始，迅即席捲全國。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在帶領工人進行抗議活動時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打傷數十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廣州後，6月3日，廣州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聲援上海人民的鬥爭。6月19日，香港的海員、電車、印務等工會率先罷工，其他工會隨即響應，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省港大罷工。23日，香港罷工工人和廣州各界群眾10萬人在廣州舉行大會和示威遊行。周恩來等率領黃埔軍校師生和校軍2000餘人參加。當遊行隊伍經過沙基時，突然遭到英國軍警開槍射擊，當場打死52人，重傷170多人。沙基慘案發生後，廣州革命政府立即宣佈同英國經濟絕交，對香港實行封鎖。省港罷工工人在廣州召開代表大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徵擔任委員長。

此後，根據形勢的變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這次運動實現了有序退卻。上海等地的罷工工人在爭得資本家接受部分經濟要求後，於1925年八九月間陸續復工；省港工人大罷工則堅持了16個月之久。直到1926年10月，罷工委員會決定結束罷工。

五卅運動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偉大愛國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給予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前所未有的打擊。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得到鍛煉和發展。中共黨員人數，1925年初尚不足千名，當年年底達到萬餘名。隨着運動推向全國，不少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如雲南、廣西、安徽、福建等地都建立了黨的組織。

### 三、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與工農運動的興起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至第六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廣東革命政府組織了東征和南征，消滅了軍閥陳炯明部和鄧本殷部，並平息了駐廣州的滇軍、桂軍的叛亂。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使揮師北伐有了比較可靠的後方。

北伐戰爭矛頭所向，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共擁兵70萬人。國民革命軍這時已有8個軍，約10萬人，第七軍和第八軍為新近歸附。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1926年5月，葉挺獨立團及第七軍一部，作為先頭部隊開赴湖南，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葉挺獨立團於1925年11月在廣東肇慶成立，在原廣東革命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鐵甲車隊基礎上組建，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全團2000多人，下轄3個營和1個直屬隊。共產黨員葉挺任團長，營長、連長和各級骨幹大多是黃埔軍校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士兵也大多由黨團員和擁護共產黨的革命青年組成，是北伐軍中政治素質最好、戰鬥力最強、基本置於共產黨影響下的部隊。

7月9日，廣東革命政府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大會，宣告北伐戰爭正式開始。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北伐軍氣勢如虹，連戰連捷。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佔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餘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佔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與此同時，北方馮玉祥成立國民聯軍，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今內蒙古巴彥淖爾）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控制了陝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國民聯軍控制了西北地區，並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的形勢極為有利。

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雖不斷增長，但尚可維持團結，共同對敵，從而保證了戰爭的順利推進。北伐軍中主要由共產黨人開展的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許多指戰員都心懷革命目標，英勇作戰，不怕犧牲。葉挺獨立團屢經惡戰，功勳卓著，為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稱號。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來自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支援。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迅速高漲。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形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1927年3月，毛澤東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充分肯定了農民運動的作用和偉大意義，回應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在一些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舉行罷工，並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群眾性的反帝鬥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但在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30多個小時的戰鬥，佔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並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後，北伐軍開進上海。至此，長江以南地區完全為北伐軍佔領。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在北伐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高漲的形勢下，黨的隊伍迅速壯大。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台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到1927年3月，中共黨員總數已將近5.8萬人。

#### 四、國共關係的破裂與大革命的失敗

國共合作一方面促成了聲勢浩大的國民革命運動，另一方面也使國共之間的矛盾不斷增長。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當年8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身亡。這使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受到極大削弱。原以中間派面貌示人的蔣介石，隨着軍事大權在握，影響和地位不斷增強，逐漸露出反共面目。國民黨右派則始終堅持反共立場，反對國共合作。

然而，當國民黨新老右派的反共活動不斷升級之時，共產國際及其在華代表卻認為，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堅決鬥爭，勢必導致國共關係破裂。中共中央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是，當國民黨右派勢力步步進逼之時，共產黨則不斷妥協退讓。

事實上，在北伐戰爭之前，革命營壘的內部矛盾已十分明顯。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佔了優勢。3月下旬，發生中山艦事件。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後，有謠

言說要劫持蔣介石。20日，蔣介石以此為藉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並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該事件後，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汪精衛也稱病去職。5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獲通過。此後，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兼軍人部部長，接着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這時已到北伐前夕。由於仍需要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蔣介石沒有立刻同共產黨決裂。

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蔣介石的實力進一步增長，國內各派反共勢力也以他為中心聚攏起來。在北伐軍控制的一些地區不斷出現殺害共產黨人，搗毀工會、農會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的事件。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佔領南京的當天，英、美軍艦藉口保護僑民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後，蔣介石加緊與帝國主義勾結。4月初，蔣介石等十餘人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清黨」。

對於迫在眉睫的危機，中共中央雖有所察覺，但未認識到形勢險惡，更沒有做好應對突然襲擊的準備。共產國際此時仍對蔣介石抱有幻想，不贊成同蔣破裂。妥協退讓的右傾錯誤路線一再延續，使挽救局勢的可能性日漸消失。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此前後，四川、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的國民黨右派也相繼實行所謂的「清黨」。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下令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一度出現3個政權。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洋政府外，蔣介石於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到武漢後，繼續同在武漢的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人合作。